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 编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获奖论文选

ZHONGGUOGONGCHANDANGDELILUNYUSHIJIANYANJIU

主编 刘建德 高尚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获奖论文选

主 编：刘建德 高尚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获奖论文选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5051 - 1551 - 4

I. 中...

II. 延...

III. 哲学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138 号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获奖论文选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 编

责任编辑：冯世平 李跃辉 责任校对：李娟 封面设计：李彤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h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84017570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2月陕西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99千字

ISBN 978 - 7 - 5051 - 1551 - 4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延安大学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可从1937年陕北公学的成立算起，迄今已有整整70年的历史。

新时期延安大学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可从1977年校党委提出成立“中共党史研究室”算起，迄今也有整整30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大学从事中共党史专业的教学研究人员，继承延安时期的优良治学传统，发挥革命圣地的红色资源优势，深入研究党的重大理论、实践经验和延安精神，发表或出版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科研成果，先后5次参加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召开的全国学术理论研讨会，先后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40多项国家、省部、厅局级科研奖励。本书选入的28篇获奖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成就。

在本书的编辑工作中，对入选论文的注释、标点符号、排



版格式等作了统一处理。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红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冯世平先生、李跃辉先生、朱地先生的热情帮助，衷心感谢入选论文作者和学校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支持，也衷心感谢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工作人员在编辑工作中的具体帮助。

编 者

2007年11月18日



目 录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 邓小平的国格论 高尚斌(1)
黄土高原农业的振兴之路 杨延虎 高 杰参加(12)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 红军东征及其历史意义 牛兴华(19)
改革开放 20 年与延安时代 高尚斌(27)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思想 郑生寿(39)
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杠杆 郭必选(51)
延安学 郭必选(66)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高尚斌(78)

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

-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基本规律 高尚斌(92)

全国高校征文优秀成果奖

- 关于在高校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思考
..... 刘建德 杜红荣(104)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延安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
..... 刘建德 马民玉 马社举(110)



延安时代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任学岭 杨伟宏(125)

陕西省面向全国征文优秀成果奖

中国精神:延安精神与现时代 郭必选(132)

“延安生活方式”初探 高九江(145)

陕西省学术理论研讨会优秀成果奖

弘扬延安精神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高尚斌(15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刘建德 杨延虎 高九江(164)

从延安时期看改革开放 20 年的基本经验 高尚斌(176)

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命运的理论思考 杨延虎(190)

论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高尚斌 杨梦丹(198)

延安特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初探 高尚斌(208)

坚定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在百年中国命运的历史昭示 杨延虎(218)

七大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构想 高尚斌(229)

让延安精神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中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 高尚斌 薛延飞(237)

陕西省高校学术理论研讨会优秀成果奖

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支柱 郭必选(244)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高九江(253)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基本经验 杨延虎(264)

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 牛兴华 杨延虎 高尚斌(273)

陕西省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再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 高尚斌(286)



邓小平的国格论

高尚斌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世界又一次发生了剧烈的大变动。西方大国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机，打着“人权”的幌子，四处煽风点火，最终促成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他们还支持中国的所谓“民主斗士”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正是在这种世界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年月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英明地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国格论”。在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人类向21世纪迈进、我国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的国格论，对于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的国格没有了，“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

国格，是一个国家在国务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品格的总称，是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品质、价值的总和，也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形象、威信的统一。如同人要珍惜人格一样，国家必须十分珍惜国格。任何国家倘若轻视了自己的国格，就意味着会丧失国格；国家一旦丧失了国格，就必定会被强权国轻蔑相待，任意摆布，甚至凌辱、宰割。这样的国家就不成其为国了。



邓小平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国格的极端重要性问题进行了极其深刻、极其透彻的论述。在中英两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他严正指出，香港的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当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最起劲地向中国鼓吹“人权”、“人格”时，邓小平敏锐地告诫世人：谈论人权、人格，切不可忘记还有一个国权、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的国权、国格，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① 邓小平还从国权、国格与人权、人格的对比中，进一步论证了国格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权、国格比人权、人格“重要得多”。西方的一些国家大肆鼓吹“人权”、“人格”，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国格，骨子里是要维护其霸权主义、强权主义者的利益。我们切不可轻信。对中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发展，人民才能生活得更美好，才能真正享有自己的一切权利。如果听任西方国家打着“人权”、“人格”的招牌来损害我们的国权、国格，造成中国的内乱，不仅根本谈不上发展，而且会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国权丧失了，国格没有了，国家大乱了，何谈“人权”、“人格”？因此，“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②

邓小平关于国格重要性的这些真知灼见，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战略家所具有的睿智眼光，对纷繁复杂现实的深刻洞察，也是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在长达一个世纪里饱受丧失国格、任人欺辱的悲惨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性结论。中国必须十分珍惜自己的国格，否则中国就站不住。中国人民曾经吃尽了丧失国格的苦头，当然就倍加珍惜自己国家的国格。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只能是国权第一、国格为先。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348页。



假如中国的什么人轻视国格问题，有损甚或丧失了国格，中国人民无疑是不会答应的。

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

国格的核心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国格表现在处理本国事务上，就是牢牢掌握自主权：中国的命运由中国人来掌握，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处理。中国决不能允许外国人干涉自己的内政，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国情去照搬别国的模式和做法。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权，中国人民从来不怕孤立，不信邪，不会被压服。邓小平提醒人们，中国依然面临着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因为在当今世界上，那些新老殖民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欺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总是有人想欺侮中国，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当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时，西方国家竟联合起来制裁中国，侵犯中国的主权，妄想使中国就范。所以我们自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也正是面对着这样一个总的世界政治格局，邓小平总是反复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和模式都不能成功。西方的某些势力越是要干涉中国内政，他就越是强调这个观点。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①。外国人对我们的干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决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而且也能办好。中国人的聪敏才智并不比外国人差，要相信自己能够干好的。

同时，邓小平总是警告西方的那些“老爷们”，不要心存幻想，谁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6 页。



干涉中国内政必然会落空。中国人民就是战胜了帝国主义和他们支持的力量而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力量很弱、困难很多的情况下，就同美国这个庞然大物打了一仗，并且取得了胜利。经过几十年发展，综合国力早已今非昔比的中国岂可在外来压力下屈服，听命于外国人的指手画脚？因此，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中国人吓不倒，压不垮。“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①，国际上的任何力量，都没有打倒中国的本领。

邓小平关于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这种“中国国格”的论述，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语言，既真切地反映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深情和无所畏惧的“硬骨头”精神，又真实地塑造了一个“东方雄狮”的中国形象。这样的理论，不仅已经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矢志不渝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战胜了西方大国联合对中国进行的制裁，而且将永远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权、藐视邪恶、坚决捍卫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国格的灵魂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因为国格深深地植根于人民对养育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国格的形成以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思想基础；国格的存在与发展最具体、最生动地表现在人民捍卫民族利益、建设富强国家、繁荣民族文化的斗争中。爱国主义精神渗透在国格的各个方面。然而，爱国主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时代和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内容。就当代中国而言，爱国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只有当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才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当今时代，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的国格就无从谈起。

邓小平就社会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关系问题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我们就是要顶住这股逆流。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① 否则，只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邓小平还从多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性。他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②有硝烟的战争打不垮，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摧不倒。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牢固，是几十年打出来的。“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人民不会把它轻易丢掉。”^③第二，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中国人民拥护的，绝不会接受外国的干涉而加以改变。如果中国搞资本主义，首先就无法解决十一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世界是个灾难，把历史拉向后退，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④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团结、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新中国、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第四，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没有行得通。中国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终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五，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句话，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总之，“中国

①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28、326、3页。



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①。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在西方国家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时刻，既为中国人民指点迷津，也告诫西方国家丢掉使中国“和平演变”的幻想。中国要继续发展，中国要保持自己的威势，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国格，只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路可走；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要求，是中国人民的要求，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又具有相当深厚的根基，并不是谁想动摇就动摇得了的。这种“中国社会主义动摇不了”的国格理论，必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而“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②

四、“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

国格，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生活中讲国格，并不是要充当老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恰恰相反，大搞霸权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只能激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抗。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舞台上从来扮演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始终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享有自己的权利。中国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而是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尊敬的国格。邓小平一再重申，中国对外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因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突出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发展问题还更加严重。虽然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国际形势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比过去更为复杂。发展中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独立自主所处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困难，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只要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就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为，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346页。



就是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只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都应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可能长久维持，少数国家垄断一切不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只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能经得住考验，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邓小平总是强调：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①。社会主义与霸权主义就如同与资本主义一样不相容。正如十亿人的中国在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一样，如果十亿人的中国在国际上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社会主义中国在国内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国际上也决不会搞霸权主义。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崇高理想和中华民族的坦荡胸怀。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宏图伟业。这样的“中国国格”，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具有，就是苏联也没有。这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一个无与伦比的崇高形象，为世界各国处理国际事务树立了光辉典范。中国因此而被世界人民视为“世界和平的保障”。

五、中国“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国格，还与对外开放唇齿相依。就是说，国格还反映在国家对外部世界是否开放和如何开放上。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中国又是一个国门敞开，向世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开放的国家；中国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又坚决地克服外来的一切腐朽东西。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对外开放的国格。

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向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开放，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进行建设必须主要依靠自己，但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自己的发展。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教训也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决然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必须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广泛进行国际交往。既向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放，又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放；既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向与自己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开放，也向那些同自己的国家关系还未正常化的国家开放。这就是所谓“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①。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主义必然会以自己的优势最终代替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又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向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开放，就是为了吸收和利用外国的资金人才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科学技术、优秀文化和管理经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对外开放后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跟着进来。如果听任别人利用输送西方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被颠覆，主权丧失，国格扫地。因此，中国既要向世界开放，又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必须坚决摒弃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坚决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

邓小平坚信，中国完全有办法克服对外开放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中国的对外开放刚刚起步时，他就指出，开放伤害不了我们，开放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后来他进一步看到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外国一些腐朽的东西进来了，中国有些人在国内外丧失国格的事发生了，丑恶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但他还是坚信，我们有力量有办法克服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我们采取法律和教育两种有效手段，我们又依靠人民的力量。只要毫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也证明，我们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邓小平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论述，既表达了新中国的宽阔胸怀，又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勇气和力量。社会主义的中国敞开自己的胸襟向世界各国开放，虚心学习、吸收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加快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使国力更增强。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敢于面对世界，迎接挑战，坚信自己完全有力量、有办法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一切消极腐朽的东西，在摒弃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和消除丑恶现象的斗争中，使国格更生辉。

六、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国格，又体现在一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严守诺言、讲求信义的行为上。如果一个国家在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往往违背诺言，抛弃信义，那就毫无国格可言。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讲信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新中国尽管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在国际活动中向来保持泱泱大国的风范，珍惜自己说话算数、严守信义的国格。

邓小平多次向世界宣告，中国是个严守信义的国家。他非常自豪地说过，我们这个国家，不仅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①。他在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谈到用“一国两制”构想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时又明确指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他还强调，我们的中央政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又是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和遵循的准则。

邓小平在一系列谈话中阐明了中国“说话算数”的表现。在世界事务中，中国制定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因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对外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体做法，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和谁都来往，与谁都交朋友。中国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行动上就一贯同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相互支持，加强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这一票“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①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因而在实践上就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分量，曾被世界上称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角；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格局里，中国还是一极。为了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一点我们说到也做到了。中国在同英国达成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中声明，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在1997年以后保持五十年不变，我们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中英两国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以来，真正恪守协议的不正是中国吗？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有许多国家包括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往往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言行两样。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就饱受帝国主义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失信”之苦。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敢于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并且真正做到了说话算数，信守诺言，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这就大大增强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信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邓小平的国格论所展现的中国，是一个十分珍惜国格而决不允许自己的独立主权遭受侵害的国家；是一个坚决捍卫自己的内政而决不屈服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